

## 第五章 九死一生的炼狱

### 一、“戴罪”发配“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

毕业分配前夕，一帮“先进分子”纷纷表态，响应祖国号召，“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分配名单还未公布，人们就都知道：“祖国”都“需要”他们留在北京！留在大城市。因为他们是政治上可靠的、有“汗马功劳”的。这样的预见最后得到证实。至于右派，给你们一个“去处”，好好去改造，接受“考验”吧！

有一小部分右派同道被上峰认定为“改造好了”。他们摘了帽，拿到毕业证书，算是“解脱”了。我因为“经过几年的改造，过去的反动言行受到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很少主动联系和检查，缺乏认识和行动，立场转变不大”（摘自我的毕业鉴定中《党支部意见》最后结语，这个结语是年级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汪作玲的亲笔），只能以“戴罪”之身去了宁夏。大学毕业生的毕业鉴定竟设有“党支部意见”这一项，且能决定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命运，这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世上仅有！此后十多年的坎坷经历，是交了这“右派”华盖运的继续。

1960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上，我们聆听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的报告。在报告进行到一半多时，周恩来来了，大学生数次鼓掌请他讲话，他最终未讲，说是来看望大家的。彭真讲话中，曾提到反右斗争，说全国划右派50万人，他说“50万哪！”时，曾用手敲了桌子，全场鸦雀无声。彭真这个人，位高权重，在北京乃至全国反右派运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反右处理阶段，我听过他的一次报告，在谈到夫妇俩中，如有一方被划为右派，要不要离婚？他说，不一定要离婚。一方可帮助另一方改造嘛！他的这一表态，也可确认是党的政策，算是“开”了点小“恩”，使有些恩爱夫妻不致拆散。

直到8月下旬，学校才宣布分配方案。在去工作单位报到前，只准假10天左右。我虽是独子，但预料中的去处是边疆省区，只能坦然面对。果不其然，我被分配去宁夏。我回到上海时，吕庆仕已从上海返回西北农学院，我俩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我急匆匆回家，还得在限定日期赶回学校，拿派遣证到派遣地报到。因为听说林昭在家养病，在上海的诸弟兄约定去看望她。

那是8月底的一天下午，是个阴天。我们一行四五个人来到淮海中路，拐到茂名南路159弄11号2楼。林昭母亲许宪民先生正好在家。她告诉我们，林昭在苏州老家。我们感到很扫兴。从和许先生的谈活中，知道她是苏州市政协委员。她说，林昭的事，影响到林昭妹妹的毕业分配。林昭妹妹1960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竟被分到地段医院。许先生要我们在沪期间在言行上多加检点，说最近上海“形势”“吃紧”。两天后，林昭从苏州来信，告知她的苏州地址（乔司空巷15号许莘转），要我去宁夏时路过苏州下车一叙。十分遗憾的是，那趟列车抵达苏州时，天色已晚（23点左右），加之倾盆大雨，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没有下车。我到宁夏后曾写信给她表达了我的歉意。

到北京，因为是有组织地集体乘车去宁夏报到，省了我的许多心。在空军总医院工作的二姐带了两个外甥女为我送行。开往银川方向的列车始发时间在深夜。在候车室里，我默默地听着二

姐的嘱咐。在西边那个角落里，萨本冀(新闻系同届毕业)的亲人中有抹眼泪的，听说萨到人大读书前是在西藏工作的，如今又要去宁夏(后来他担任过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列车奔驰在华北原野上。硬座车厢昏暗的灯光下坐着无精打采的、被饥饿笼罩着的乘客，没有歌声、没有欢笑。到张家口，已感到寒气渗人。同班的张涧(即张健)同学正在和另一位别的班上的同学，欣赏着新到手的毕业证书。我不但因政治原因被剥夺了领取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书的权利，而且此次西去的命运如何，还是个未知数。19年后的1979年9月初，我才收到人大给我寄来的毕业证书。这是红塑料本，封面“中国人民大学”是华国锋题字。校长成仿吾。证书编号是：“补004号”。

在大青山南麓，列车继续缓慢地向西爬行。路两边特别荒凉、人烟稀少。我像一个被发配充军的囚徒，茫然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昏昏沉沉地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了一个巴掌大的车站，哦，有人说银川到了！

在去自治区民政厅人事局招待所报到的路上，远远看到旁边一幢平房门口有块大牌子。有人说，这可能是所小学，车到跟前，“宁夏师范学院”校牌几乎顶天立地地赫然在目。一路上看不到一幢像样的建筑物。有个顺口溜说：“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这就是当时银川市真实写照。

我们住进了自治区民政厅人事局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一式的土平房，房基砌五六层砖，再上面是用“胡基”(即将湿黄土在木模里挤压而成，待风干后使用)砌成的。我们睡通铺，十多人住一大间房。招待所饭菜是每人每顿一个黑呼呼的那种碜牙的馒头、一碗水煮青菜(看不见油花)。一天两顿。待分配的日子无聊得只好去逛逛街。街上无任何可购之食品，包括水果糖、水果、面包之类一切可以充饥、果腹的东西。商店破旧、货架空空，里面一股酸霉气。道路坎坷不平，汽车少有，只好回到宿舍，瞎聊一气。张涧说，来宁夏也好，打起仗来安全些。他不说

倒也罢了，这一说反倒引来了话头。一位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宁夏的哥们立即反驳：“安全个屁！导弹、原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他对来宁夏满肚子牢骚，正好趁此机会发泄。张润再没跟他辩。

有一天下午，附近的唐徕渠决口了，我们紧急集合。“同学们，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有人站出来，把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待分配毕业生组织起来，到区冶金局职工宿舍，抢救箱子等财物。待我们完成任务回来，这招待所已夷为平地，数十间房子都“趴”下了。因为水淹到“胡基”后，“胡基”就成了“豆腐渣”，幸好我们的行李都被安全转移了。我们得到了口头传达：因为抢险，我们受到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玉槐的“表扬”。

住到自治区第二招待所之后不久，我的那些“同窗们”，都陆陆续续有了归宿，有去报社、电台的，也有去高校和出版社的。其他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也大部分有了去处。剩下的一批人，虽互相不认识，但都心中有数，彼此彼此，同病相怜，属于“待处理品”。待了二十多天，“上方”才开始派发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我终于接到通知，要我去自治区民政厅人事局。接待我的一个人事干部和我寒暄了几句，就拨起了电话：“农垦局吗？”“分给你们一个人民大学的！”“是新闻系的。”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这里回答说：“是，是老右！”他明明知道我在旁边，却旁若无人地极不文明地说话，活像电影里十九世纪贩卖黑奴时的吆喝。这笔“交易”通过电话“推搡”了半天，终于成交。不受欢迎的交易物是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次日，我拿着介绍信到自治区农垦局报到。一个办事员递给我一张事先早已填写好的介绍信告诉我，已研究决定让我去该局所属的在同心县的王团庄农场。对这一决定，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

后来，我了解到，同心县属宁夏西海固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现在的原州区和西吉、海原、固原、彭原、泾源、隆德、同心等7个县共3万多平方公里，这片黄土地沟壑纵横、十年九旱、资源匮乏，自古有“苦甲天下”之称。陕甘总督左宗棠曾上书清廷，

称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这里的“陇中”就包括现在的定西为代表的甘肃省中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西海固地区。1972年，西海固地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如果说，西海固地区“苦甲天下”，那么，作为该地区的8个贫困县(区)之一的同心县，就应是“苦甲西海固”了。这个1.6万平方公里的县(指当时的面积，后来行政区域有调整)，年均降水量才200多毫米，但年蒸发量却达1000毫米。最特殊的是该县绝大部份的河水、井水都是苦的，不能饮用，人们靠收集地表水储存到水窖生活。这个县有个公社(后改为乡)就叫“喊叫水”，但它并非全县最缺水地区，有的村还能打出淡水井来。这里山大沟深，广种薄收，一年种一季庄稼，粮食(糜、谷、春小麦)亩产平均不到50公斤，遇上大旱之年，颗粒无收。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

同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回族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以上，是宁夏乃至全国回族人口最多的县，约26万多人。

买了去同心县城的长途汽车票，第二天我就动身了，一路向南，越走越荒凉。一蟹不如一蟹。能让我感到希奇的是路上有一群群拖着粗大尾巴的绵羊。在车上，我和也到同心的一对夫妇交谈。男的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自治区革委会担任常委的牟元礼。他在不久前刚从北大荒调来宁夏，就在王团庄农场工作。这次，他和他的夫人去了趟山西大同，看望岳父(岳父在某军事院校任教)回来。他介绍了王团庄农场的大致情况。他们夫妇俩住在农场场部的一个地窑里，这种窑洞是在平地挖下去，比如四五米深，形成一个地平线下的长方形“院子”，在“院子”里，再往北、往西、往东、甚至往南挖窑洞。地窑上面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从地面到地下的“院子”可挖好土台阶。地窑里可往地面设置烟道。这种窑洞冬暖夏凉。后来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发现他家里到处挂的是圣母玛利亚像。让我十分好奇的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家，牟还是场党总支委员！如果说这一两口之家有天主教徒的话，只能是牟夫人了。

下午4点多到达同心县城。这是新县城。目力所及，一个车站、一个旅社和一个小饭店，还有县邮电局、县供销总社。西北方向有几排房子，是县中，旁边还有个小发电厂，据说发电机还是清朝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使用过的75千瓦的发电机。朝东望去，远处有些平房，可能就是当地“官府”了。老县城在南面，约一公里左右远。明代因遭水患，老城半数倾圮，故称“半个城”。著名的同心清真寺也在那里。

和我同车来的甘肃师大化学系毕业的夏靖荣（分在同心中学），一下车，像掉了魂似的连连喊：“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两年后，他真的打回老家去，回甘肃靖远县工作。我则默默地等待农场来县城拉物的汽车。

到达离县城8公里的农场，一看更让我失望。这个农场场部拥有数十间土坯平房，还有一个机耕队。下面设立和公社一样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在场部报到后，我又被派发到附近生产队的一个打谷场（当地人叫“场院”）旁看场者住的弓腰低头才能进去的一间矮小的土屋内（场上已无可看守之物了），算是给了个落脚栖身之地。

## 二、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一到生产队，我的粮食月定量从在北京时的细粮18公斤陡降至原粮9.25公斤，加工成面粉即细粮仅有7公斤，且是在生产队食堂就餐，连这7公斤都要打折扣才吃到嘴。一天两顿稀糊糊，是用附近清水河里的苦水熬煮出来的。这苦水水质是高盐碱、高矿化和高含氟的。每升苦水约含盐份3700毫克。这种苦水用来洗衣服、洗头发都不行（衣服洗不干净、头发洗后黏结在一起）。初

来几天里，我严重水土不服，最厉害时一天腹泻16次。后来因吃食堂掺和糜糠的稀饭而便秘。不时里急后重，十分痛苦，反复用手抠，才能便下。有一次，管库房的管理员看我呻吟得痛不欲生，把灌牲口用的清油给我吃了100克，才打通了严重阻塞的肠道。饥荒，正时时威胁着当地的回汉人民的生命，人们忙着挖“老鼠仓”（黄鼠为越冬准备的“粮库”），鼠口夺食，有时竟也有斩获，一个“老鼠仓”就能挖到5公斤多粮食。社员们有的打草籽；有的收拾马铃薯秆，据说可以晒干磨碎后掺和粮食吃。

我到这个农场报到后，白天劳动。有天晚上，场部民兵巡逻，也把我叫上，领队的也要给我发步枪，我借故不会使枪没有拿。这个“怪事”记得我曾在给林昭的信里告诉过她，也跟她谈到当时我的恶劣处境。后来，她来过一信，希望我忍耐克服困难，还提到她有朋友曾去过宁夏吴忠，那里有毛纺厂，如我以后有机会去吴忠，代她买几斤毛线。此后，我们再没有通信。那时，我无法动弹，新来乍到，不好请假；不请假，偷偷地去吴忠也不行，买汽车票也要单位介绍信的。当时，宁夏城乡正在严厉地开展“双反运动”（即反对坏人坏事运动），车站、旅社盘查甚严，饭馆里即使有粮票也买不到饭。人们即使就地困守，也饿得走不动路，抬不起腿。这些，身在苏州的林昭是根本无法知道的。

后来，我又奉命到场部南面的罗家河湾生产队劳动。给我住的一孔箍窑，远离庄子，孤零零地立在银川至平凉的公路边上（路西）。窑主人前不久“走西口”逃荒去新疆了。窑内除了一个土炕外，还有一扇用芨芨草之类编织起来的“门”。这个“门”，用时把门洞虚掩起来，不用时拿起来放到墙根边。一个木格子小窗，上面糊的报纸已千疮百孔。没烧头（“烧头”，燃料。这里指填炕取暖的东西。如煤、柴草、驴马粪之类），睡冷炕。去劳动或到一公里外的生产队食堂吃饭，只好虚掩着“门”。感谢真主保佑，那时还没有人偷我的行李铺盖。抑或有人看到这家主人家徒四壁，“乌巴里的”（当地回民的土话：

“怪可怜的”），不忍下手。我的一只皮箱则放在生产队库房里。如果你为了看行李铺盖，不出工，那你到食堂就打不到饭。那时，天不黑就睡。我辗转反侧，浑身痛得不能入眠，怎么换个睡姿都不行。有一次，我脱下裤衩一看，发呆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终于哭了。我看到了什么？我的整个髓骨和过去见过的人体骨骼标本中的毫无二致，多恐怖！才从北京下来两个多月，已瘦得皮包骨头，连虱子也不光顾了。

1960年12月，场部又让我到余家沟生产队，住的一孔箍窑（在银平路之东十几米）终于可以上锁了，但我的粮食月定量只有6.75公斤原粮了（加工成面粉约5公斤）。再这样下去，怕是撑不住了。每当睡下时，我就“回味”当年在南通吃的狮子头、在扬州富春茶社吃的“三丁包子”、在淮阴吃的大螃蟹、在北京吃的烤鸭，甚至梦想旁边看到的任何器物（甚至一块土坯）要变成食物多好。正好此时，有社员要卖一头“老乏驴”，这头驴本已奄奄一息了。我和另一汉民花了11元买了这头驴。请一回民宰杀，驴皮就是酬金。当地有谚云：“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对于我们，是否“龙肉”已无关紧要，救命乃第一要务。即便弄到肉，燃料还是问题。向老乡学习，劳动之余，见到驴粪蛋就拾，晾干后作为燃料。用刀子将冻驴肉切成涮羊肉那样的薄片，在炒勺里颠几下变了颜色，加点盐，就可下肚。饥饿日复一日在夺取人的生命。除了这驴，我还吃了一些死胎羊肉、死骡肉等，如没有这些，我早就“无常”了。

我曾一度脸上浮肿，在场部医务室，医生给我吃炒熟的黄豆面搓成的圆子。这才渐渐消肿。一般说，回民宁可饿死也不吃死的骆驼、牛、羊、鸡、兔之类的，至于马、驴、骡肉更是不吃的。生产队的牲畜，没有精饲料，连草都吃不饱，也在饥饿中挣扎。度日如年，我好不容易挨过了难忘的1960。

新年后的一天，天蒙蒙亮，队里的回族饲养员赶来通风报信，说一头从内蒙古买来不久的马死了（实际上是连饿带冻死了的），要我赶紧去。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拿上藏刀（刚向社



员买的），到了清水河畔的饲养圈，只见一头马倒毙在圈里，已冻得硬邦邦的。求生的欲望，让我浑身来了劲。上次剥驴皮我已见识过，这次，该我操刀动手了。快刀加上我的麻利，很快，我扛上两条马后腿和用背斗装上马肝、马肺回去，其他的马肉、马杂碎等一切可食部份，自有人去“收拾”的。我先煮了些马肝蘸盐吃。但到下午，有社员就对我说：“老江，你嘴脸不对！”说“嘴脸不对”，这是一种善意的警告，是说你的身体上有了凶兆。我到自己窑里查了一下我带来的《辞源》（民国二十四年出版），在“马肝”条目中，明明白白地说“马肝有毒”。心想，幸亏没有多吃，好险！于是，我把另外没有舍得吃的马肝挖坑埋掉了。

天阴沉沉的，寒气逼人。一天下午我刚下工回到窑里，和衣躺在炕上休息。一个10岁左右的回族小姑娘，靠着窑门，指着立在左边墙根的冻马腿，央求我给她一点。她要我的“救命肉”。我对她说：“这是死马肉，你们回回是不吃的。”磨蹭了半天，她才失望地离去。事后想想，她拿去一点死马肉，也无法吃，也进不了家。在这回民的庄子里，我给了她死马肉，一旦她家人追究起来，我这右派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次日黎明，随着一阵嘈杂声，我打开窑门，只见在正前方百米多远的回民公墓里，一群人正在举行葬礼。在地下新挖掘的地窑中，安息的正是昨天站在我窑门口的那个小姑娘！

县卫生院前院长董某、朱某、县卫生防疫站沙某（右派），1979年10月18日曾在豫旺中学教工宿舍和我谈起1960、1961年的情况。当时的县委书记文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他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因为看到县监狱死人太多（死人冻得硬邦邦的，晚上用胶轮架子车把尸体呈井字形码好，拉出去掩埋掉），于是，问计于董某等院长、医生：怎样才能少死人、不死人？董等提出了“劳逸结合”，让犯人少劳动或不劳动、增加粮食定量、食物中添加豆制品等人人皆知的措施。神仙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了。

不久，同心县开放了农贸市场。听说县上农贸市场是农历一、四、七逢集。有一次，我和一些社员去赶集。集上有卖吃的，煮熟的马铃薯、干粮馍、高价点心、炸油香……真是大开眼界。人饿得两只眼睛直盯着马上就能吃的。半公斤点心（硬硬的“月饼”）下肚没有感觉，接着就见一样，买了吃一样，吃了买、买了吃，在集上的5个多小时，把领的上月32元“生活费”吃个光光。当时农场生产队食堂每月伙食费才2元。好在是在较长时间段陆续吃的，且没喝水，据有经验的人说，如果我把这些都一口气吃完，再喝水，生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非撑死不可。

春天来了。饥饿的人们，背着背篋，从饲养圈里起粪，把粪送到大田。我是中专学过农的，土壤学、肥料学、畜牧学都学过，也都懂点。这“粪”不比黄土强多少。这哪里是在上肥，这是“黄土搬家”。社员也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反正田是集体的，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到春耕时，队里牲口已大“减员”，死里逃生生活下来的，只能慢慢让它们逐渐恢复体力，不能用于耕作。于是，队里饥饿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十几个人拉一张犁。边犁边播撒马铃薯种（块茎）。这块茎是拌了草木灰、煤灰的，饥饿的人们哪管这些，只要有机会，抓到薯种，立马在裤子上擦一下，就往嘴里送。我也入境随俗，不再斯文了。

这时，我的窑洞又住进两个人，他们是胶东宫氏两兄弟。哥哥是农场党总支委员，转业军人，在部队时是炮兵营长，曾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并入朝作过战。不知什么缘故，被突然下放到队里劳动。弟弟因家乡山东牟平闹饥荒，投奔哥哥而来。他们兄弟俩和我相处得还融洽。我问过老宫，张灵甫的部队好对付不？他回答说：“难啃！”，据他说，这支部队官兵年龄都在30岁上下，有战斗力。他们兄弟俩有一台小收音机，我们一道收听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现场报道。这半年，我无报可看，无书可读（除了唯一的一部《辞源》），无广播可听（也不敢购买收音机，怕被怀疑收听敌台，那是有大罪的）。浑浑噩噩过日子。

这半年，我没有洗过澡、擦过身、泡过脚。每年冬春，是这

里沙尘暴肆虐的季节。人们浑身上下没有干净的地方，拍拍打打就是净身的唯一办法。沙尘无孔不入，紧闭门窗也无济于事。最厉害时，即便大白天，沙尘暴一旦光临，顿时暗无天日，加上凄厉的风暴声，犹如到了世纪末，人们呼吸都有了窒息感。屋里点了灯，才可冲淡些这种恐怖气氛。当地社员们的生活也很艰苦。举些例子，社员们穿的内衣都是“连轴转”的，不分季节，没有可换洗的，洗衣服苦水洗不干净，淡水连做饭都没有，所以，很多人的衣服都有汗渍的大块白斑。越这样穿，衣服越肯坏，呈恶性循环，加之布票限量供应，社员又缺钱，日子过得很艰辛。孩子的被子尿湿了，铲两锹干沙土在湿的地方，吸一下水分后，再拍拍打打晾干了完事，不可能也无条件去拆洗的。那里地广人稀，村子里看不到厕所。人们在地头大便后，就随便找一块土坷垃擦屁股完事，他们纸张也缺，更别谈使用卫生纸了。偏僻的村庄连苦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驮，于是，吃过饭的饭碗都用一种你想都想不出来的“洗碗法”：到稍远的地方用锹在地表下深挖半锹土，用这“净土”擦净饭碗。穷苦人家更连炕席都没有。在队里的食堂吃了稀得照得见人的“饭”，到食堂里讨一点“涮槽”（社员戏称“洗碗”为“涮槽”）的苦水，还要看炊事员的脸色。

我在“享用”不能维持生命的极低的粮食定量的情况下，靠着吃点死畜、死禽和买的那头老乏驴，艰难度日，唯一庆幸的，我终于存活了下来。有人调遣你从这个队到那个队劳动，但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场长韩某，只是在我来场报到时见过一面，以后再没见到过，听说他最热衷的是打猎。人们读到过《夹边沟记事》、《兴凯湖纪事》还有有关清河农场的故事，谁知道，还有一批右派是作为孤立的个体，在所谓的人民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中，让你去挣扎，不管你的死活，考验你的生命力。